中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道德心理有何差异？

胡晓檬　喻丰　彭凯平

摘要：现代西方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自创立以来，经过百年发展，文献丰富、成果显著、流派众多，反观中国的道德心理学，虽已积累一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成果，但是终究缺乏基于中国文化的伦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加之基于实验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实证探索十分有限，因此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本文试图梳理并评述现代取向的西方主流道德心理学理论及其局限、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道德心理论述及其未来展望，以期激发未来研究者共同推进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情怀的中国道德心理学话语体系构建，最终服务于描述、解释、预测和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

关键词：伦理学，道德心理学，传统文化，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胡晓檬，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北京，100872）；

喻丰，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武汉，430071）；

彭凯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1.引言

古今中外，道德是人类亘古不变所追寻的核心议题。探讨道德的学科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神经科学、灵长类动物学、人类学等。关于道德的概念界定很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定义有："道德是关于人们应该如何相互联结、有关正义、权利和福利的规范性判断（Turiel, 1983, p. 3)"。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Haidt 提出了一个替代 Turiel 的定义，它强调道德系统的功能而不是内容本身 (Haidt, 2008)。他将道德定义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实践、制度和进化的心理机制，它们共同抑制或调节自私并使合作成为可能（Haidt, 2008, p. 800）。" 我们认为，道德是基于人类长期进化和文化塑造所习得的社会规范，它界定了人们应该如何思想、感受和作为，创设了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的评判标准。

道德心理学关注人类在道德情境中的运作方式，并探寻这些发现如何促进伦理学的理论思辨（Doris & Stich, 2006）。这个领域涵盖哲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且综合了多个理论视角，正在经历多学科的复兴和繁荣（Haidt, 2007）。古今中外，已有诸多道德理论试图描绘和解释人类复杂、多面、深刻的道德心理现象。早期的思想渊源包括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的《论语》和孟子的《孟子》。本文旨在介绍并评述西方文化背景下现代取向的道德心理学理论、方法和实证依据，并初步阐述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道德心理观点，同时提出对既有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和批评，以期引导未来学者关注道德心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推动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情怀的道德心理学话语体系构建。

2. 现代西方道德心理学主流理论

2.1 哲学根基

当代道德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由三大流派构成：功利论、义务论和美德伦理学。秉持功利主义的学者认为（代表人物为边沁和密尔），最佳的道德应使人们的幸福最大化，某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带来了多少好的结果。而主张义务论的学者认为（代表人物为康德），任何行为都应由绝对的道德原则来判断，无论结果多好。例如，无论可以挽救多少人，杀戮都是普遍错误的。也就是说，"目的不能辩护手段的合理性"（Amit & Greene，2012）。而美德伦理学断言，人们普遍具有某些好的和坏的道德品质，道德机构应当努力促进诚实、同情、善良等良好的美德（Hursthouse，1999）。尽管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之间存在根本分歧，但它们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例如强调简约、推理以及关注抽象和普适原则等等（Haidt & Kesebir, 2010）。而且，这两种思想传统都将伦理探究的范围从美德伦理学家的"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转移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的问题 (Haidt & Kesebir, 2010)。尽管如此，美德伦理

学的思潮和取向正在复兴，人们愈发关注道德制度的社会责任和内在道德品质的重要性。西方伦理学为道德心理学提供了丰厚而深刻的思想基础，比如火车难题等思想实验为实验伦理学提供了研究内容和故事素材，从而使得伦理学与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结合成为可能。但是，伦理学探讨的问题属于“应然”层面，暨“人们应当如何去做”，而社会心理学探讨的问题属于“实然”层面，暨“人们将会如何去做”，两者之间的鸿沟尚未得到妥善的弥合，实验伦理学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直接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仍需进一步的求索与验证。

2.2 理论流派

西方道德心理学综合了多个知识体系，受到了哲学、人类学、宗教学、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影响，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在近代呈现出多个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态势(Hadit, 2007)。在这些背景下，伦理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形成了全面而深刻的西方道德心理学话语体系。20 世纪以来涌现了诸多道德的理论和范式，其中包括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理论（1925）、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理论（1962）、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1932）、科尔伯格的道德阶段理论（1958）、吉利根的道德发展理论(1988)、Turiel 的社会互动理论 (1979)、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 (1986) 等等。最近 20 年以来，两个主要的理论视角主导了道德心理学的研究：第一种是发展心理学取向，研究道德观念和道德推理的起源、获得和发展；另一种是社会心理学取向，通过综合进化、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探究道德直觉、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Haidt，2008）。下面本文将评介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西方道德心理学理论。

2.3 道德基础理论

道德基础理论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简称 MFT) 是现代取向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它很好的解释了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心理基础，并且得到了大量跨文化证据的可靠支撑 (Graham et al., 2011; Graham, Haidt, & Nosek, 2009; Haidt & Joseph, 2004, 2007; Haidt, 2001, 2013)。MFT 将道德判断视为审美判断，主要由道德直觉驱动，并将道德直觉定义如下：“意识中或在意识边缘突然出现人们对一个人的性格或行为的评价和感受（喜欢-不喜欢，好-坏），没有任何觉知并已经历了搜索信息、权衡证据或推断结论的心理过程”（Haidt & Bjorklund，2008）。尽管理性主义思潮占据了 200 多年的主导地位，但 MFT 拥抱了重塑道德心理学格局的六种趋势。这些趋势包括情感革命、文化心理学复兴、自动化革命、神经科学、灵长类动物学和进化心理学（Haidt，2013）。认知革命在 1960 年代重新塑造了心理学的面貌，然而被后来的变化浪潮所改写，特别是 1980 年代以来的“情感革命”（Graham，2013）。最著名的一句话来自大卫·休谟：“理性是且仅是激情的奴隶（1777/2011，p. 2）”。道德基础

理论采纳了休谟的基本见解，并将其置于社交对话的背景中。1980 年代中期，由文化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里、史蒂文·海涅、哈里·特里安迪斯、理查德·尼斯贝特等领导的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对道德心理学的框架产生了重大影响。 MFT 采取多元化的方法，试图将一般框架应用于各种形式的文化，如国界、政治取向、社会阶层等。 道德基础理论还结合了神经科学、灵长类动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经验证据，提供了一个多视角和稳健的社会心理学模型。

Haidt 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社会直觉主义模型 (SIM)，试图综合过去几十年中道德心理学的工作成果。 SIM 提出了关于道德判断背后的心理过程的三个主要原则（Graham et al，2013 ；Haidt，2007 ；Haidt & Kesebir，2010 ） ：1）直觉优先，推理第二。尽管个体经常进行深思熟虑的推理，但在道德问题的判断过程中会自动产生快速而轻松的道德直觉。审慎推理主要是对初始评价感觉的事后合理化。然而，SIM 并未断言道德说服是不可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发生；2）道德不仅仅是关爱和公平。 道德基础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道德范畴概念，即道德超越了关爱和公平。当我们仔细观察其他文化时，我们会发现各种与 WERID 文化 (Henrich et al., 2010)截然不同的道德规范。例如，韩国人非常重视权威，伊斯兰文化非常重视纯洁。 道德基础理论提出了五个“最佳候选人”，旨在解释跨文化道德差异的潜在心理基础；3) 道德使人盲目和束缚。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道德镜头看世界。人们有动力形成一个道德社区，该社区规定成员应该如何行事，实现极端的群体团结，满足人们的归属需求，例如宗教组织（Haidt，2007）。但是，凝聚力极强的道德群体之间的道德分歧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总之，MFT 是一种本土主义、直觉主义和多元主义的道德研究方法（Graham ，2013）。值得注意的是，MFT 框架内的先天成分并不意味着在出生时就存在或对所有人或所有文化的普遍表达，而是意味着先于经验（Marcus，2004）。重要的是，道德基础意味着通过进化过程发展起来的普遍心理准备（Seligman，1971）。毫无疑问，MFT 对道德心理学的论述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以多样化的方式重塑了当代道德心理学的面貌。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功能主义的道德定义，并通过超越伤害和公平来拓宽道德的范围。其次，它采用多元化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偏见，并允许学者对亚文化差异有更细致的理解。第三，它为证明道德判断的直觉性质（例如对道德厌恶的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并试图调和推理和直觉的争论。总之，MFT 在过去二十年中广泛影响了道德的概念界定、理论演变和实际应用，并且在未来十年肯定会以一种在概念上和实践上都有意义的方式激发更多研究。

大多数批评都指向 Haidt (2001) 的挑衅性主张，即“道德判断是因果过程的自动结果，而不是反思和推理的审视结果”。 MFT 将道德推理过程视为可以很好地服务于社会说服目的的事后合理化。其他研究人员对社会直觉主义模型的这一核心主张表示怀疑。他们认为，道德判断过

程可能是一个迭代过程，其中直觉过程与理性、深思熟虑的过程交织在一起（Saltzstein & Kasachkoff，2004）。“道德失语”(moral dumbfounding)这个现象是指人们往往无法明确地推理和口头表达他们认为某些道德行为是对还是错的原因。这被认为是道德判断主要由情绪过程驱动的证据。然而，它不能证明直觉决定道德判断并排除推理的关键作用。此外，MFT 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来揭示这些道德直觉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刻意的道德推理只是事后证明，那么道德直觉不应源自迭代推理过程的高潮。尽管如此，MFT 理论家们一致认为，他们过多地关注了最初的道德判断，而对道德随着经验如何发展和改进的过程关注不够（Graham， 2013）。尽管 MFT 理论家们综合了进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等多个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成为“道德基础”的若干标准，但最初选择的五名 “候选人 “仍然显得有些随意而不是系统的和理论驱动的结论。 MFT 理论家们承认可能存在其他候选者，例如自由/压迫、效率/浪费和所有权/盗窃，但他们是否符合资格仍需进一步验证。

2.3 双过程加工理论

基于双过程模型的一般框架以及道德基础理论提供的概念化和经验证据，Greene 等人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过程模型（Dual Process of Moral Judgment，简称 DPM），试图解释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与 MFT 一致，DPM 认可情绪在道德决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这一点已有行为实验和 fMRI 证据的验证（Greene, Sommerville, Nystrom, Darley & Cohen，2001 ）。然而，DPM 认为道德判断是 “认知”（涉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主人而不是“情绪”（快速直觉判断，更多依赖与情绪反应有关的大脑区域）的仆人（Greene， Morelli、Lowenberg、Nystrom & Cohen，2008 ）。Greene 等人认为道德判断中的认知和情感类似于功利主义推理与道义原则的关系，这些相互交织的过程在大脑中不断相互竞争。尽管如此，DPM 同意基本的直觉主义主张，即快速、自动、充满情感的处理通常会驱动道德推理并将其转化为合理化（Graham，2013）。

Greene 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同于 MFT 中使用的各种类型的道德违规。道德困境，尤其是电车难题是最常用的道德场景。DPM 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心理过程共同决定了道德判断的结果：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这些过程对应于特定的大脑区域，它们之间要么协同工作，要么相互竞争以“获胜”。最近，DPM 提出了一个“整合道德判断”框架来揭示背后的心理过程，行为实验和神经科学证据都支持这样的假设，即杏仁核提供了对相关行为的情感评估，而 vmPFC 整合了该信号对预期结果进行功利性评估，以产生“考虑到所有因素”之后的道德判断（Shenhav & Greene，2014 ）。

DPM 为情感和理性如何在道德决策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 fMRI 和行为证据都表明，个体对各种形式的道德困境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绪反应。同时，理性能够通过执行功利主义原则来压倒最初的情绪反应。DPM 强调了双重过程理论在道德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对 MFT 强调的直觉主义道德方法表示怀疑。总之，DPM 主张理性主义方法的回归，并强调道德困境之间的对比，这激发了未来的研究更为仔细地探究道德推理的潜在心理机制。

情感和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相对作用仍在争论中。 DPM 提供了实证证据来论证道德推理的关键作用。例如，Greene、Morelli、Lowenberg、Nystrom 和 Cohen (2008) 发现，认知负荷确实会减缓功利论者对道德困境的反应，这表明推理在道德判断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它似乎并没有改变最终的道德判断，这与两个过程独立工作相互对抗的观点不一致（Haidt & Kesebir，2010）。主要限制之一是 DPM 采用抽象的道德困境（例如电车问题）。将被试置于安静的实验室环境中本身会增加推理过程的相对重要性，来自真实世界、更令人信服的证据将为 DPM 提供更有力的实证支持。 DPM 也缺乏跨文化证据来证明其普遍适用性。大多数样本是美国大学生或在线人群。 DPM 在不同文化之间或文化内部是否有或大或小的文化差异，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意义的问题。重要的是，DPM 因其“反向推理”而被社会神经科学家诟病。 DPM 应提供行为证据以建立心理过程和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一致的 fMRI 证据验证该理论主张。然而，DMP 提供的大多数证据都是直接的 fMRI 结果，它推导出了道德判断的双重过程模型。最后，新提出的“整合道德判断”模型可能对不同的子群体有不同的作用。有人对推理过程高度敏感，而另一些人则更容易发现情绪线索。个体差异可能在调节情绪和推理之间的特定交互模式中发挥作用。同时，DPM 尚未考虑整合框架的边界条件。

2.4 道德动机理论

全球化进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美国社会的当代文化战争，更加凸显了理解道德分歧的必要性。 Janoff-Bulman 及其同事提出了一种道德动机理论 (Model of Moral Motives, 简称 MMM) （Janoff-Bulman，2009 ；Janoff-Bulman、Sheikh & Baldacci，2008 ），旨在解释这些道德差异背后的基本心理动机。 MMM 声称，跨越基本的趋近-回避动机和自我-他人焦点可以产生四种道德动机：自我约束（回避自我）、自力更生（趋近自我）、不伤害（回避他人）、帮助他人（趋近他人） （Janoff-Bulman et al，2008 ）。他们还在政治取向的背景下研究了这些道德动机并得出结论，政治保守主义与回避动机有关，自由主义与趋近动机有关（Janoff-Bulman et al.，2008 ；Janoff-Bulman、Sheikh & Hepp，2009 ）。

重要的是，MMM 回顾了以前的实证证据，发现在禁止性道德(proscriptive morality)和规范性道德(prescriptive morality)之间存在大量证据。禁令侧重于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并且更加严厉和要求更高，而规范侧重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并且是自由裁量且不那么严格（Janoff-Bulman et al.，2008 ；Janoff-Bulman et al.，2009 ）。此外，MMM 认为，禁止道德更符合以对与错的规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规范道德则与促进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相呼应。道德发展研究表明，不同年龄组的儿童能够在早期道德规范中区分禁止性道德和规范性道德（Janoff-Bulman et al.，2009）。因此，MMM 通过结合趋近/激活和避免/抑制系统对潜在的道德动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MMM 进一步修订了理论框架，纳入了两种基于群体的道德：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因此，MMM 整合了一个包含两个分析水平的 2 × 3 模型，为群体提供服务，个人应努力承担共同责任，而保护群体应团结起来，加强共同体的团结。有趣的是，MMM 提出了一种社会嵌入的道德观（Carnes，Lickel，& Janoff-Bulman，2015 ），以探讨不同的道德原则如何满足特定情境的要求并有助于成功调节人类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检验特定的社会背景是否可以解释人们对在社会群体中运作和规范的道德原则的主观看法。结果表明，人们如何评价不同类型的群体时存在独特的心理模式。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忠诚是亲密群体（例如家庭成员）中的主要运作原则，公平是社会类别（内部群体成员）和任务群体（例如同事）的主要原则，而圣洁是最大的相对原则，适用于松散的协会（例如咖啡店里的陌生人）。MMM 试图更好地理解道德差异的潜在动机以及它如何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从概念上讲，它整合了行为抑制与激活系统（Carver & White，1994）和调控焦点理论（Higgins，1998）的框架。与 MFT 在声称保守派有更广泛的道德关切引起巨大争议相反，MMM 并没有声称保守派或自由派拥有或多或少的道德范围，而是包含对个体和群体的有责任有意义的理解（Janoff-Bulman et al.，2008 ）。正如 Janoff-Bulman (2008)所说，“通过尝试理解和欣赏他人的道德动机，我们可能不会总是达成更大的共识，但我们仍然可能实现更文明社会的有价值的目标”。MMM 为解释意识形态差异提供了全面而动态的观点。该框架整合了行为激活/抑制理论，区分了两种基本道德：规定性与禁止性，这反映了道德规范的双重系统。 MMM 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提供了一种概念化道德领域的新视角。尽管 MMM 有助于突出潜在的道德动机，但它可能过于笼统，无法为具体的道德差异提供细致入微的解释，例如功利主义原则和道义原则之间的经典道德困境。此外，它在理论上也无助于调和直觉与推理之间的争论。最后，MMM 在文化上是普遍的还是特定的尚待清晰的回应。

3.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道德心理学

3.1 哲学根基

中国人关于道德的论述和研究历史悠久、丰富多元、思想深刻，中国古代的伦理学话语体系，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无不充斥着关于“道”和“德”、以及“伦理之心”的论述和阐释，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孟子提出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墨子的“兼爱天下”、管子的“礼义廉耻”等等（刘峻杉 & 张俊，2013）。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当代伦理学经历了蜿蜒曲折的发展历程。学者认为，中国伦理学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所谓中国特色，是要凸显中国伦理文化、反映中国时代风貌、对接中国重大问题（李建华，2019）。下文将会简要阐述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道德心理观。

3.2 本土视角的道德：一种道德还是两种道德？

3.2.1 儒家的道德心理观

目前道德心理学领域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完善的心理学理论来描绘和诠释中国人的道德体系。然而，许多学者提供了概念上和实证上的意义框架挑战西方的主流理论。Bedford 和 Hwang (2003) 强调了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心理差异，他们认为，犹太教-基督教关于生命起源的观点表明，人是上帝创造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格是在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内部定义的，个人目标比群体目标更重要。许多研究支持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的特征（Hofstede，1980；Triandis、Bontempo、Villareal、Asai & Lucca，1988）。相反，儒家文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强调人的生命是祖先的遗产。家庭被概念化为扩大的自我，自我的界限足够灵活，可以包括家庭成员和重要他人（Hwang，1998）。Hwang (1995) 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通过参考积极/消极和不完美/完美义务之间的区别来辨别儒家伦理的特征。在理性主义主导道德心理学的时期，科尔伯格（Kohlberg，1971）就道德发展的跨文化普遍性提出了著名的主张："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个人都使用相同的基本道德类别、概念或原则，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个人都经历相同的总体阶段发展顺序或顺序，尽管他们的发展速度和终点各不相同（p.19）。科尔伯格的理论被批评为科学文化偏见的案例（Simpson，1974）。Shweder 和 Bourne (1992) 指责该理论将男性、白人、美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视为道德成熟的终点，这是从西方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制定的 (Shweder & Bourne，1982）。Hwang 指出，Kolhberg 的理论未能认识到伦理哲学背后的实质差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族中心主义的系统偏见（Hwang，1998）。他将这些西方伦理与东亚儒家伦理进行对比，以提供一个适当的框架来解释中国社会的道德推理。Hwang (1998) 指出，儒家通过为中国社会的二元关系设想了五个基本伦理，对某些特定关系提出了具体的伦

理要求。这五种基本关系中的角色或功能各不相同，说明各自强调的核心价值观也各不相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圣君舜治国，高尧为臣，舜之父苦夔杀人，何为？（《孟子传》第七章）。孟子的回答代表了儒家对道德困境的解决。“顺圣王身为国君，不应禁止法官逮捕杀人凶手的父亲。但是，作为父亲的孝子，他不能允许父亲受到惩罚。”孟子建议他放弃君王之位，和他的罪父一起逃到一个超越权责范围的地方。在孔子看来，这样的决议是最合适的（Hwang，1998）。深刻的文化差异可能源于对完美/积极和不完美/消极义务的不同强调。消极责任是要求不采取行动（例如不杀人、不欺骗、不偷窃），而积极责任通常被表述为指导行动的格言（例如实践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儒家的人道有正负两方面。孟子提出了一个经验法则：先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然后再照顾一般的老年人；先养自己的孩子，再爱别人的孩子（《孟子》）。通过对儒家文化传统的仔细分析，Hwang (1995) 提出了一个关系主义的模型来描绘中国人对道德的看法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蕴含的人际义务。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但传统文化信仰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尤其是道德判断过程中。Hu 等人发现，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个体在面临道德困境时确实会优先考虑关系伦理而不是公正伦理 (Hu et al., 2018)。

3.2.1 道家的道德心理观

道教是从萨满教发展而来的中国基本哲学思想，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过程（Lee, Chen, & Chan, 2013）。东西方个体在慷慨和无私等利他主义方面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道教信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老子提出的“上善若水”的观念。Lee 等人提出了“水性人格” (Water-like personality)，包括灵活、透明、温和、持久和强大，作为识别道家的人格方法。西方的道德观非常强调慈悲、正义、忠诚、自由等美德，而道家和老子的哲学更注重和谐，包括与自身的和谐、与他人的和谐，与大自然的和谐（Lee，2003）。因此，考虑这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对于构建中国道德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以及丰富和补充未来全球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图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2.3 文化的影响：普适还是差异？

心理学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文化在道德判断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注重从文化间视角、文化内视角和多元文化视角来动态考察文化与道德之间的建构关系（胡晓檬，喻丰，彭凯平，2018）。道德镶嵌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之中，一个人的道德是由进化层面上的初始模板，然后随着他们在特定文化中成长起来，具有特定的生活经历而构建的（Graham et al.，2013）。

比如游牧文化所珍视的美德与农业文化、城市居民培育的美德截然不同（Nisbett & Cohen，2006）。基因和文化被假设共同进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以支持这些高度相互依赖的群体中的人类生活，因为群体生活提供了大量增强生存、健康、繁衍的益处（Richerson & Boyd，2005）。那么，道德心理究竟是文化普适还是文化特异？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取决于具体的分析水平。在进化意义上，道德对于每个社会和群落都是重要的社会规范，道德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些社会功能和深层机制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但是，人们究竟看重哪些美德、哪些文化情境强化哪些道德心理维度、文化变迁如何重塑道德图谱，这些道德内容层面是文化特异的变化过程。正如 Shweder (1998) 所说，"一种思想，多种心态(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立场，即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会从普遍思想的潜力中发展出适宜于他们自己文化背景下的可持续的心态或生活方式的细节。这个问题目前仍在争议之中，仍需学者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视角进一步拓展理论思考，积累跨文化的实证研究，对已有的普适假设和差异假设进行证实或者证伪，以期得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更稳健的研究结论。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中西方社会心理学视角的道德理论的文献综述是不完整的，仍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替代框架来分析道德的起源、功能和心理机制。例如，Rai & Fiske (2011) 提出道德心理学是关系调节，Gray(2012)提出了基于伤害的道德一元论等等。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理论和方法都具有文化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可能不太适用于非 WEIRD 文化(Henrich, et al., 2010)。 展望未来，道德心理学领域将会沿着三个方向不断发展与进步，一是继续结合西方伦理学思想和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开展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索，进行中西方文化比较。比如将哲学家的思想实验（著名的火车问题等）编制成道德两难故事，询问不同个体和群体的直觉性道德判断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及其文化差异等。第二个发展方向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研究者愈发关注道德判断与行为的文化差异问题。人类的道德心理是长期进化与文化学习的交互产物，未来仍需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方面，人类的道德心理具有文化普适性或者文化特异性。第三个新兴的发展态势则是开始尝试运用交叉学科的技术手段，比如大数据、脑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模型等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创新而前沿的探索和挖掘。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道德心理学必须超越 "怪人 "群体，研究中国人复杂鲜活的道德生活，揭示中国人道德心理背后运行的心理机制，从而指导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未来十年，道德心理学将会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整合的态势，在多个分析层次上探究道德问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正如著

名道德心理学家 Haidt (2013) 指出的那样，21 世纪的道德心理学正处于黄金时代——因为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充满全球威胁、公地困境、文化阶级和不公正的世纪。

参考文献

Amit, E., & Greene, J. D. (2012). You see, the ends don't justify the means visual imagery and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8), 861-868.

Carnes, N. C., Lickel, B., & Janoff-Bulman, R. (2015). Shared Perceptions Morality Is Embedded in Social Contex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0146167214566187.

Carver, C. S., & White, T. L. (1994). Behavioral inhibition, behavioral activation, and affective responses to impend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the BIS/BAS scales. *J Pers Soc Psychol, 67*(2), 319.

Graham, J., Haidt, J., Koleva, S., Motyl, M., Iyer, R., Wojcik, S., & Ditto, P. H. (2013).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55-130.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 Pers Soc Psychol, 96*(5), 1029-1046. doi: 10.1037/a0015141

Greene, J. (2009). Dual-process morality and the personal/impersonal distinction: A reply to McGuire, Langdon, Coltheart, and Mackenzi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3), 581-584. doi: 10.1016/j.jesp.2009.01.003

Greene, J. (2014). *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 Atlantic Books Ltd.

Greene,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2008).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07*(3), 1144-1154.

Greene, J. D., Sommerville, R. B., Nystrom, L. E.,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1).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Science, 293*(5537), 2105-2108.

Haidt, J. (2007).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316*(5827), 998-1002. doi: 10.1126/science.1137651

Haidt, J. (2008). Moralit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 65-72.

Haidt, J. (2013). Moral psych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2*(3), 281-297. doi: 10.1080/03057240.2013.817327

Haidt, J., & Bjorklund, F. (2008). Social intuitionists answer six questions about moral psychology. *Moral psychology, 2*, 181-217.

Haidt, J., & Joseph, C. (2004). Intuitive ethics: How innately prepared intuitions generate culturally variable virtues. *Daedalus, 133*(4), 55-66.

Haidt, J., & Kesebir, S. (2010). Morality. In S.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 Hobeken, NJ: Wiley.

Higgins, E. T. (1998).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al principl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0*, 1-46.

Hu, X., Chen, S. X., Zhang, L., Yu, F., Peng, K., & Liu, L. (2018). Do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affect young adults' moral priorit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799.

Hursthouse, R. (1999). *On virtue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off-Bulman, R. (2009). To provide or protect: Motivational base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2-3), 120-128.

Janoff-Bulman, R., Sheikh, S., & Baldacci, K. G. (2008). Mapping moral motives: Approach, avoidance,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4), 1091-1099.

Janoff-Bulman, R., Sheikh, S., & Hepp, S. (2009). Proscriptive versus prescriptive morality: two faces of moral regulation. *J Pers Soc Psychol, 96*(3), 521.

Marcus, G. (2004). *The birth of the mind: How a tiny number of genes creates the complexities of human thought*: Basic Books.

Saltzstein, H. D., & Kasachkoff, T. (2004). Haidt's Moral Intuitionist Theory: A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Critiqu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8*(4), 273-282. doi: 10.1037/1089-2680.8.4.273

Seligman, M. E. (1971). Phobias and preparedness. *Behavior therapy, 2*(3), 307-320.

Shenhav, A., & Greene, J. D. (2014). Integrative moral judgment: dissociating the roles of the amygdala and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4*(13), 4741-4749.

Bedford, O., & Hwang, K. K. (2003). Guilt and Shame in Chinese Culture: 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and Identit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2), 127-144.

Cohen, A. B. (2009). Many forms of cultu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3), 194.

Graham, J., Haidt, J., Koleva, S., Motyl, M., Iyer, R., Wojcik, S., & Ditto, P. H. (2013).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55-130.

Haidt, J., & Kesebir, S. (2010). Morality. In S.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 Hobeken, NJ: Wiley.

Harman, G. (1985). Is there a single true morality? *Morality, reason and truth*, 33.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2-3), 61-83.

Hofstede, G. (1980).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5-41.

Hwang, K. K. (1998). Two moralities: Reinterpreting the finding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moral reasoning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211-238.

Kim, K. R., Kang, J.-S., & Yun, S. (2012). Moral Intuition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1*(1), 173-185. doi: 10.2466/17.09.21.pr0.111.4.173-185

Lee, Y-T. (2003). Daoistic humanism in ancient China: Broadening personality and counseling theo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3(1), 64-85.

Lee, Y.-T., Chen, W., & Chan, S. X. (2013). Daoism and Altruism: A China–USA Perspective *Altruism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pp. 85-100): Springer.

Lumsden, C. J. (1989). Does culture need genes?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0*(1), 11-28.

Lutwak, N., Razzino, B. E., & Ferrari, J. R. (1998). Self-perceptions and moral affect: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subcultural diversity in guilt and shame emotions.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3*(2), 333-348.

Moore, A. B., Lee, N. L., Clark, B. A., & Conway, A. R. (2011). In defense of the personal/impersonal distinction in moral psychology research: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 of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moral judgment.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6*(3), 186-195.

Morris, M., & Leung, K. (2000). Justice for all?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Applied Psychology, 49*(1), 100-132.

Shweder, R., Much, N., Mahapatra, M., & Park, L. (1997). Divinity and the" Big Three" Explanations of Suffering. *Morality and health, 119.*

Shweder, R. A. (1999). Why cultural psychology? *Ethos, 27*(1), 62-73.

Shweder, R. A., & Bourne, E. J. (1982). *Does the concept of the person vary cross-culturally?* : Springer.

Simpson, E. L. (1974). Mo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Human Development, 17*(2), 81-106.

Triandis, H. C. (1995).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Westview Press.

Triandis, H. C., Bontempo, R., Villareal, M. J., Asai, M., & Lucca, N. (198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lf-ingroup relationships. *J Pers Soc Psychol, 54*(2), 323.

Vauclair, C. M., & Fischer, R. (2011). Do cultural values predict individuals' moral attitudes? A cross-cultural multilevel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5), 645-657.

Turiel, E.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knowledge: Morality and conv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刘峻杉, & 张俊. (2013). 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的德育价值——基于三种美德体系的比较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35(12), 83-89.

李建华. (2019. 8. 13). 中国伦理学发展的着力点. *人民网*

胡晓檬, 喻丰, & 彭凯平. (2018). 文化如何影响道德? 文化间变异, 文化内变异与多元文化的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6(11), 2081-2090.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moral mindset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Hu Xiaomeng [1] **Peng Kaiping** [2] **Yu Feng** [3]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modern Western ethics and moral psychology have undergone hundreds of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literature is rich, the results are remarkable, and there are many schools of thought. In contrast, Chinese moral psychology has accumulated certain amounts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 but lack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upled with the limite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which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ynthesize modern Western mainstream moral psychology theories and their limit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psyc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in order to inspire future researchers to jointly promote Chinese scholars has both global perspective and local senti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ral psychology discourse system ultimately serves to describe, explain, predict and enhance the advancement of moral psychology and moral behaviors of Chinese people.

Keywords: Ethics, Moral Psycholog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discourse

联系方式：

胡晓檬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汇贤大厦 D 座 903 室，100872，电话：18618306025，邮箱：xiaomenghu@ruc.edu.cn